第1章　概述

本书立足于从美学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展开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据统计，我国西南地区长期居住的少数民族多达30余个，主要包括彝、白、壮、傣、傈僳、哈尼、拉祜、苗、回、藏、佤、布朗、普米、纳西、瑶、景颇、阿昌、独龙、蒙古、基诺等。苗族是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本书以苗族为代表，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审美意识进行研究。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学者们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少数民族文学展开了研究。苗族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分布极广的少数民族。苗族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的炎黄传说时代。苗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文学作品。

1.1.1　国内外研究动态

苗族文学研究是民族研究的重点领域，学者们从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对此展开了研究。在历史上，苗族是一个历经战乱和迁徙的民族，在中国境内居住着约950万苗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宗教意识和民族迁徙，赋予了苗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文化影响了苗族对世界的认知和表现，从而形成了苗族独有的审美意识。苗族的审美意识也融入了形式多样的文学作品。

在国内，苗族文学有上千年的历史，苗族文学的起源多和宗教、游戏、巫术、劳动有关。苗族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苗族传统文化是其民族生存的精神堡垒。苗族文学多以口传形式流传，苗族文学的文字记载至今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苗族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进行了全面梳理，编辑出版了《苗族文学史》（1981、2003）。本书所研究的苗族现当代文学，则是根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苗族文学史》（1981、2003）的划分，即对1950年以后的苗族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苗族现当代文学出现了更多的文字形式，除了苗语以外，还出现了苗族作家采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巴略、王秀盈编著的《苗族文学概论》（2006）从不同体裁的角度对苗族文学进行了系统整理。

国内关于苗族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包含：（1）对苗族文学史的研究，构建了苗族文学观（何圣伦，2017）。（2）对苗族文学进行全方位评述。国内对苗族文学的评述主要从思想解读和艺术解读的角度展开。思想解读包括分析文学价值、传播学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艺术解读以艺术批评为主，包括对其作品形态特点和艺术特色的述评等。

国外苗族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苗族文学以美国苗族作家迪阿查（Dia Cha）和美国白人作家那玛·杰·利沃（Norma J. Livo）出版的《苗族民间故事：老挝、泰国、越南民族》（1991）作为开端。《橡树林中的翠竹——现当代苗族文学作品集》（2002）的出版，成为苗族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历经近30个春秋的发展，苗族文学已成为世界少数族裔文学的重要构成，并出现了短篇故事、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关于苗族文学的研究则兴起稍晚，最早的研究有美国学者罗宾·维·本森（Robin Vue Benson）发表的题为《从头来过我的生活：苗族及美国移民的经历》（1998）的书评。2010年后，文学界对苗族文学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但多数研究仍局限于书评，学术价值不大。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苗族文学作品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人们不再局限于对文学作品进行书评，而是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纵观国内外对苗族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对苗族文学的研究都经历了整理、编撰和述评的阶段。苗族文学体裁多样，包括民间口传、诗歌、小说、神话故事等；文字记载也出现了多语言的情况。苗族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书着眼于苗族现当代文学审美研究，基于以下考虑：首先，进行苗族现当代文学研究，有利于再现和解读不同国家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其次，从审美的角度对苗族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是由于苗族历史悠久，其文学创作受到原始宗教意识、民族迁徙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苗族民族文化复杂丰富，必然体现出苗族审美意识的独特性；苗族的神巫文化影响着苗族对世界的认知，神巫文化的影响贯穿着苗族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苗族支系众多，各支系在世代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亚族群文化，使苗族审美文化更加丰富；苗族在迁徙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必将受到他族文化的影响，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苗族审美意识的复杂度，其审美意识也有可能产生差异。

1.1.2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文学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构成，民族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智慧和艺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反映了民族文化心态，苗族是一个地理分布极广的少数民族族群，研究苗族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深入系统地研究苗族文学，有助于丰富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文献，更好地反映苗族文学受多元文化影响形成的多样化族裔文学；研究苗族文学，有助于深入了解苗族民族心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研究苗族文学，有利于探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规律和走向，以便为其他民族文学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苗族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审美的角度研究苗族文学，可以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评价苗族文学，了解苗族文化和苗族整体发展，促进苗学体系完善和苗族研究全面发展。

苗族是一个分布极广的少数民族。正是由于苗族的地理分布特点，其文学创作受到多族文化的影响。从审美的角度研究苗族文学，从应用价值上讲，有利于合理利用苗族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更加有效地开展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同时，从文学研究入手，还有助于理解民族问题的源起和处理方式。

1.2 研究对象

本书立足于从美学角度对苗族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研究对象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苗族文学作品，体裁包括小说、诗歌、短篇故事、散文、戏剧等。苗族现当代文学以陈靖、姜穆、伍略、李必雨、向秀清、石定、吴雪恼、贺晓彤等作家作品为代表，并有两部《苗族文学史》（1981、2003）、《中国苗族文学丛书》（1994）、《沈从文全集》（2002）、《当代中国苗族作家作品选集》（2008）为参考。其中，《当代中国苗族作家作品选集》（2008）是中国目前收录苗族作家最多、质量最高、规模最大的现当代中国苗族作家作品选集。本书以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度剖析了苗族现当代文学体现的苗族审美意识的共性和个性特征，从新的视角丰富苗族现当代文学研究文献，希望为研究苗族文化尽微薄之力。

1.3 总体框架

本书通过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探讨苗族审美意识，围绕苗族审美意识如何参与中心文化和主流文化展开。审美意识属于美学范畴，涵盖审美活动中多种心理活动，如审美观念、审美认知、审美态度、审美理想、审美体验、审美能力、审美感受、审美判断、审美趣味等。本书以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梳理和解读，勾勒出本书的总体框架：(1) 对苗族的迁徙历史进行梳理，分析苗族迁徙历史和苗族审美意识的关系；(2) 分析苗族生活环境和苗族审美意识的关系；(3) 从真善意识、崇生意识、神巫意识、生态意识四个方面探讨苗族审美意识内涵；(4) 从阴柔、尚力、拙稚、繁复、狞厉五个方面探讨苗族美学基本范式及其和苗族审美意识的关系；(5) 从苗族迁徙和苗族女性之美、苗族生活环境和苗族女性之美、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之美、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女性之美分析苗族女性形象；(6) 分析苗族生活艺术中的“美”的形成和体现。

1.4 重点难点

本书的重点在于：(1) 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少数民族文学，将审美意识融入苗族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2) 结合西方美学和东方美学研究苗族现当代文学中的审美意识；(3) 综合不同的文学体裁，挖掘苗族审美意识内涵；(4) 以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为基础，结合田野调查，走访苗族村寨，深入了解苗族历史、宗教、礼仪、节日、服饰等历史文化元素，深度剖析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体现。

本书的难点有如下几点：(1) 研究苗族现当代文学是跨语言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会接触苗语和汉语，必要时需进行不同语言的语码转换，在进行多语研究时如何原汁原味保留其文化特点和传统风俗习惯，是本书需要突破的难点之一。(2) 苗族支系众多，即使是同一国家，不同地域生活的苗族也会有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区别。在进行研究时，如何抓住不同苗族支系的共性特点，突出个性特点，是本书需突破的难点之二。(3) 苗族文学形式多样，包含口传文学、流传的文字记载和散文、小说、诗歌、短篇故事等，如何从审美的角度诠释不同体裁的苗族文学作品，从其独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俗发现苗族审美意识内涵，是本书拟突破的难点之三。

1.5 主要目标

本书从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出发，结合田野调查，在丰富的苗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基础上，对苗族的审美意识进行梳理。力图以美学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对影响苗族审美意识的多元因素、苗族审美意识内涵、苗族审美范式、苗族女性之美、苗族审美意识的形成和表现进行研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凸显苗族审美文化的共性和个性，最后对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生活艺术形式蕴含的审美意识进行诠释。

1.6 研究方法

苗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文化体系，不同的苗族支系构成了亚苗族文化，各种亚苗族文化的共生共存、相互体认是激活苗族文化发展和流传的动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当代苗族文学不仅出现了更多的体裁，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繁衍起来。苗族现当代文学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创作发展空间，又共享着苗族文化的同一文化渊源。从苗族文化的文化主体和传承过程来看，它们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影响和交流。苗族文化属于同质同体文化，不同支系的苗族文化共同成为苗族文化生态系统的成分。因此，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苗族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承载的苗族历史文化是苗族研究的必然趋势，也是苗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苗族文化的形成具有几千年的历史，风格独特，又颇具神秘色彩，本书从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收集分析，充分结合民间文化文学调研，深入了解苗族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背景，以开拓对苗族文学审美研究的新视角，发现苗族文化之“美”，补充对苗族研究的严重不足。

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比较文学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审美体现可谓异彩纷呈，本书将对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收集、分类、归纳和整理，从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提炼出体现苗族审美意识的文字资料，并从苗族迁徙历史、生活环境以及审美意识内涵的四个方面（真善意识、崇生意识、神巫意识、生态意识）、苗族美学基本范式的五个方面（阴柔、尚力、拙稚、繁复、狞厉）、苗族女性之美以及苗族生活艺术进行主题式分类。文献分析法立足于分析整理已有的苗族现当代文学文字资料，为文本研究的开展做好文字资料准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田野调查法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研究方法，本书从苗族审美意识产生的四个方面展开调查：(1) 苗族的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一个民族的道德价值、功利价值和审美价值影响着它们的物质生产过程，如材料选择、造型设计、装饰工艺等，苗族生产过程的物质形式也正是苗族心理创造性和审美满足感的体现，因此具有了美学意义。(2) 苗族仪式。对苗族仪式的调查是还原苗族文化载体美学意义的方式。苗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苗族仪式众多，常常伴有说唱歌舞，能给人们带来满足和快乐，自然能体现苗族的审美意识。(3) 生活习俗。对现当代苗族生活习俗的调研是研究苗族审美意识的重要途径。深入苗族村寨了解其生活习惯、衣食住行等可以观察苗族特有的心理趋向和审美情趣。(4) 传统文艺遗产。对苗族传统文艺遗产的考察是研究苗族审美意识的直接途径，如苗族古歌、民间故事、口传文学、苗族刺绣、剪纸纹样的文艺载体等都是苗族审美最直接的表现。

本书中的比较文学分析法主要用于比较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苗族女性形象。虽然苗族现当代文学体现出苗族的共性审美意识，但由于作家性别不同，势必会体现一些个性审美特点，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对苗族女性美的不同关注点以及从对苗族女性美描述的不同视角。

除了以上研究方法以外，本书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及修辞学、词汇学和语言学知识，从审美角度对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和研究。

第 2 章　苗族迁徙历史和苗族审美意识

苗族是一个历经迁徙的民族，苗族审美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历史、生活环境、文化习俗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几乎无间断的迁徙生活在苗族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影响着整个民族对生命的诠释、对文化的定义、对历史的记忆。李泽厚（1990）曾对审美意识的产生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审美意识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主观反映，由于审美主体存在个体差异，审美意识也存在区别。即使是同一个审美主体，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也就是说，审美个体可能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苗族相对闭塞的居住环境以及在迁徙历史中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群体相互融合，都使苗族的审美意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苗族以聚居为主的生活方式、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使苗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保持，也使苗族的审美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苗族独有的对生命的理解也影响了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肉体和灵魂的关系等的诠释，并在此基础上萌生了原始的生态意识、和谐意识和崇生意识。

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在他的著作《山地的移民》中认为，苗族是世界上苦难深重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之一（石朝江，2006）。苗族是一个国际性民族，分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两个半球。苗族起源于中国。据考证，苗族历史上经历了五次大迁徙。苗族的迁徙路线可以大致概括为：从黄河流域出发，迁至湘、黔、滇、桂等地，再经云南进入东南亚的老挝、越南、泰国等。越南战争结束后，居住在老挝的苗族途经泰国向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西方国家迁移，实现了苗族的国际性转变。

迁徙是苗族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事件，也是现当代苗族的道德意识、文化特征、族群思想、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迁徙对苗族支系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苗族迁徙史是苗族历史的表达，是苗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苗族审美意识滋生的土壤。任何民族的审美意识都和社会意识密不可分。审美意识是一种自发的心理活动，存在于审美对象中，以具体形式展现。审美意识强调了人的心理感受，它和群体的功利价值给予人的满足感、宗教信

仰带给人的精神寄托有关。审美意识的发展经历了从物质满足到精神满足的阶段，人们只有在得到物质生活的满足以后，才会追求精神上的舒适。民族审美心理的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苗族的迁徙历史见证了苗族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苗族从简单的物质功利需求，发展到精神功利需求，最后到审美需求的过程。苗族迁徙历史塑造了苗族审美意识中的以劳动为美和以悲壮为美的审美表现。

2.1 劳动为美意识

以劳动为美，是任何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带有功利性质的精神追求。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长期的迁徙生活给苗族的物质生产带来了诸多困难，使苗族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物质上的满足成为苗族的最大愿望。苗族的精神追求也与物质满足息息相关。因此，苗族的每个支系都会毫无疑问地歌颂与劳动有关的所有实践活动。苗族将对劳动的歌颂在口传、散文、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中展现出来。苗族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赞美劳动，美化劳动场面，歌颂劳动创造力，并神圣化劳动产品、人格化自然环境。苗族自古以来，就流传了很多开天辟地、伐木造船、植树种草、犁田耙地的巨人形象，在苗族现当代文学中，也饱含对诸多工匠和能织会绣的苗族妇女的描写。在苗族刺绣和苗族银饰中，至今都保留了飞禽走兽和花草虫鱼等与苗族物质生活追求相关的图案。

在苗族的迁徙进程中，塑造了以劳动为美的意识。热爱劳动是苗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苗族古歌《开天辟地》里就有姜央出生得最早，他来造天造地、造山造水、创造昆虫、创造鬼神、创造草木、创造撵山的狗、创造犁田的牛、创造司晨的鸡、创造我们和你们等的描写。姜央是苗族传说中最早以人的面目出现的始祖，也是苗族创造的劳动能手，是苗族心目中勤劳的化身。

苗族的不同支系都经历了漫长的迁徙过程。在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以劳动为美的体现。在中国，苗族人口约为 950 万，在 56 个民族中位居第五，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湖南、广西、湖北、重庆、海南、广东、福建、江苏等地。苗族常以村寨为单位聚居。尽管苗族有自己的语言，但中国苗族现当代文学多以汉语创作，中国苗族文学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鼎盛。

苗族现当代文学成就最高非苗族小说莫属，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苗族文学成就可谓登峰造极（乐黛云、朱群慧，2007）。现当代苗族文学以各种体裁记录了苗族的迁徙历史和生活状态，字里行间表现了苗族的审美意识。苗族以劳

动为美的意识在苗族作家的作品中得以呈现。伍略的短篇小说《虎年纪事》有一段有关苗族少年告方上山砍巴茅草的情节。告方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伍略使用了“熟练”“眼疾手快”“反身一抽”等词形容告方劳动时动作的敏捷，还使用了“精致”“闪亮”等形容告方的劳动工具——砍刀。

杨明渊的散文《苗乡春节》提到苗族人在大年初二薄明时分起床，走过寨道去挑水的习俗。这一习俗传承了苗族人勤劳的美德，体现了苗族以劳动为美的意识。挑水的习俗源于古时苗族的一个传说。传说中苗族山寨里有一个哑巴男孩，非常勤劳。过年时，人们都在欢庆中，哑巴男孩仍然上山劳动。口渴乏力时，就舀了井里的水喝下去，回到家就能开口说话了。

石太瑞的诗歌《我从大山归来》歌颂了苗族妇女绣花的勤劳。李文明在散文《春米》中生动地刻画了母亲辛勤劳动的场景。母亲数十年如一日舂米给家人吃，即使到了年迈之时，也不停息。书中描写道“母亲”舂米时身拄拐杖，向前倾斜着佝偻的身子……咚咚的碓声缓慢而沉重。刘扬烈在散文《凤凰·苗乡·边城》中提到在新时代苗族有了新观念，生活在阿拉营的苗族并不保守，有的南下深圳，有的北上哈尔滨，要么打工，要么做生意。这些走进都市的“乡巴佬”，同样闯出了一条路，这世界本来就属于勤劳、勇敢的人们。

滕和叶在小说《月亮升在葡萄架》中写道，“月牯”既精灵又勤快，早上鸡鸣就起身，打扫房子、院子、挑水、捞饭、扯猪菜；接着，“月牯”又洗衣、劈柴、收拾菜园，样样事情都做得井井有条。“月牯”干女生的活；比女生心细，做男生的工作，也不输男生。

古文凤在散文《母亲的纺织》中描述了“母亲”和“外婆”都擅长挑花刺绣。苗家的女性常常从七八岁就开始学习刺绣了。苗家姑娘的纺织、挑花、刺绣技艺是衡量其是否勤劳的重要标准。“母亲”的一生都在纺织中度过，为了养育儿女，“母亲”纺麻织布、耕田种地，没日没夜地劳作。

《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是“80 后”苗族作家杨嘉莉出版的一部苗族迁徙史纪实小说，记录了苗族艰辛的迁徙历程。苗族的迁徙过程也是一路流亡和寻求庇护的历程，居无定所的现实生活状况造成了他们的物质生产困难重重，苗族生产力发展尤其缓慢，生活质量不高。杨嘉莉在《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中复现了许多苗族在迁徙过程中食不果腹的场景。例如，“……他看着家里那些忍饥挨饿的孩子们……他们生活在饥饿和恐

惧当中”① “……大家都饥饿难耐……”②，迁徙中的苗族最大的精神满足就是获得足够的生活所需。杨嘉莉在《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中多处表现出对劳动的赞美。苗族妇女擅长刺绣，她们通过将图案绣在衣服和各种装饰物上，以此记录苗族人的故事，叙述苗族人的历史。杨嘉莉的妈妈就曾送给杨嘉莉一些刺绣制品，“……这是她在烈日下花了几个小时才做好的……”③。苗族长期生活在较为偏远闭塞的乡间，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杨嘉莉的父亲在逃亡期间一直希望他们能有自己的农场，养满鸡和猪。这就是当时苗族人理想中的生活。以当时的生活现状，这样的希望只能成为泡影，但苗族人以劳动为美的意识一直存在。在暂居地，杨嘉莉和她的族人每天出去拾柴，找寻食物，以满足生活需要。当杨嘉莉和家人定居以后，杨嘉莉的父亲还进了工厂工作。在苗族人看来，唯有劳动才能使人获得安全感，才能让自己的家人融入主流社会，让苗族人的生命得以延续。杨嘉莉的父亲坚持把孩子们都送去学校读书，希望她们努力学习。在她的父亲看来，读书能让孩子们具备劳动能力，将来才能帮助整个家族在社会上立足。

苗族的迁徙孕育了苗族的审美意识。迁徙历程陪伴着苗族审美意识逐步走向成熟，以劳动为美是苗族最早形成的美的概念。正如以上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苗族人以勤劳为美，以劳动获取物质财富、满足物质需求为荣。在苗族人的眼里，劳动的人会得到神灵的庇佑，获取福报。苗族人不仅赞扬劳动的人，还美化劳动工具和劳动产物。苗族在迁徙途中，长期忍饥挨饿，基本的物质需求都常常得不到满足。苗族崇尚劳动，正是出于对基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

苗族以劳动为美意识的形成和苗族的迁徙历程有着直接的关系。迁徙使苗族人流离失所，过着流散和逃亡的生活。苗族人在迁徙过程中，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可以耕作的良田，还忍受着和家人分离的痛苦。在迁徙过程中，苗族人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得不到满足，这便促成了他们以劳动为美的意识。苗族人认同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并通过物质上的满足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

① 杨嘉莉：《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王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② 杨嘉莉：《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王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③ 杨嘉莉：《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王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2.2　悲壮为美意识

以悲壮为美是和苗族迁徙史最密不可分的美学风格。苗族迁徙历史使苗族人在生活中常常充满了危机感。在苗族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苗族人心中都满怀对种族发展的期待，也充满了对种族覆灭的担忧。民族的生存和传承成了每个苗族人共同的使命。苗族人长期负重前行，沉重的使命感激活了个体在逆境中自我升华的悲剧思想。苗族是众多迁徙民族中最为悲壮的民族，苗族迁徙都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而被迫流亡，是一种无目的、无组织、无止境的迁徙。苗族迁徙的特点也使苗族产生了众多支系，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生活模式。苗族离散的迁徙特点对民族存亡产生了很大威胁，容易造成民族的分裂剥蚀、瓦解分化，甚至民族消亡。尽管苗族人在迁徙过程中隐匿在深山密林中，但苗族人的精神是自由的。在迁徙历程中，苗族的危机意识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每一个成员。苗族的每个支系都保留着民族认归仪式，苗族人怀揣着深厚的归家意识和强烈的民族归属意识。苗族地区都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如小孩出生时有喊魂仪式，旨在将人的魂魄喊回肉身之内；在去世时有指路仪式，在指路仪式中，苗族人会在葬礼中专门请人吟唱“指路经”，并杀鸡杀牛，指引去世的人回到出生时的地方，将去世者的亡灵带回想象中的家园。

苗族人在长期的流散生活中，一直很注重精神家园的创造。家园意识是苗族精神世界的反映，是苗族挥之不去的沉重民族记忆，体现了苗族迁徙历程的悲剧色彩。苗族对精神家园的向往体现在生活细节中则表现为苗族的悲壮之美。例如苗族传统的椎牛节活动，是苗族最为严肃庄重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椎牛节活动中，先由苗族巫师选好坪地，竖好五彩神柱，并将水牯牛绑在神柱上，杀牛人手握梭镖刺向水牯牛，接着苗族人便开始瓜分牛肉，通宵跳鼓对歌。整个仪式显得十分悲壮。苗族人的诸多习俗和艺术形式都体现了悲壮的美学意识，流露了对祖先的追思，如苗族人上刀山、下油锅的民间技艺，芦笙舞的上下翻滚、头抢地等动作，都无不表现出苗族的悲壮之美。

苗族现当代文学将苗族的悲壮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李文明的散文《远去的风景》中，作者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怀念了故乡曾经的美景。文中这样描写：这分明是树们痛苦的呻吟啊……故乡的森林就这样迅速地从我老屋边，从我的寨边撤退而去，越去越远，甚至找不到一棵大树……生物链断裂，大自然循环系统和消化功能紊乱了……李文明在散文《难忘九秋》中描述了村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那些古歌大多是叙述战争、部族迁徙和开疆辟土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悲壮历程……那些旋律单纯凝重而忧伤，节奏缓慢而意志坚强地在历史长河中流传千年的原始拙朴的歌谣……从那沉郁而苍凉的古歌中，你已读懂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沧桑……苗族的迁徙史也是苗族的悲壮史，苗族的悲壮源于对民族生命的珍惜、对民族文化的守护、对民族家园的热爱、对生活困境的坚持、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以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等众多方面。

太阿在散文《麻阳船》中讲述了麻阳人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注定一生漂泊，在水上度过一生，无休无止寻找出路。当麻阳人老了、病了，也只能蜷缩在破旧的船中，聆听潺潺的流水声，喘着粗气，想象家乡的橘子林，咽下一口长流水，只有这长流水能建立起他们与家乡的联系，麻阳人在恍惚中仿佛看到了家乡的水车、水牛、羊群……来不及畅吸一口去，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唯有一艘白帆，将他带回家乡。这便是麻阳人悲壮的一生，命运在无声的漂泊中显得那么简单，生于土，活于水，最终又融于土。

向启军在小说《迁徙的魂》中描写了苗族迁徙时的悲壮与无助。在书中，向启军写道，“我感觉到每一茎草每一粒石子每一棵树都在无声诉说。埋葬了那些战死的父老兄弟，离开了被毁坏的破烂家园”①，战败的部落默默走着，屈辱的民族脸上没有泪。苗族迁徙时男人几乎裸露着身体，倒下的人太多了，残存的人太少了，肩上背负的责任太重大了。已被烧焦了的雉尾仍在飘扬，山崩了，地裂了，也不能将这个民族消灭。孩子、妇女、老人，相互搀扶着艰难跋涉。

苗族在迁徙过程中充满了种族危机意识。杨嘉莉在《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中写道，从记事起，她就被告知她是苗人，苗族的民族印迹深深刻在心中。自我认同及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是苗人的永恒使命，激发了苗族个体在逆境中试图超越环境和自我救赎的悲剧心态。苗族的迁徙历程非常悲壮，几乎都是为了逃亡，他们度过了漫长的流离失所的生活。在《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中，杨嘉莉写道，父亲和母亲相识于 1978 年。那时，他们和各自的家人一起在丛林中躲藏了三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果腹之物、栖身之所，“我”的父母习惯了背上沉重的包袱一路前行，习惯肩上因包袱磨出的血痂，习惯饥肠辘辘的感觉。但是，父母还年轻，他们渴望活下来。苗族的迁徙历程犹如亡命一般，给民族命运带来了巨大危险，将民族剥蚀分裂。家人们可能走散，去到不同的地方，大家都一路寻找，坚信自己的同族会在某个地方等待自己，族人能够再次相聚。

① 向启军：《向启军小说散文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 257 页。

苗族人有着强大的精神世界，最为突出的就是归家意识，苗族归家的精神诉求呈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中，杨嘉莉有次突然身患重病，她想到的是苗人的心（全家会携手保护族人的心、苗人因为没有家园而落泪的心、苗岭的苍翠高山和清新空气的心）。杨嘉莉觉得自己的心已经破碎，这让她的祖母十分担心，努力将她的灵魂喊回来。对于苗族而言，迁徙是他们共同的经历，苗族在迁徙中承受着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沉重压力，他们作为难民浪迹天涯，深居在密林之中。尽管环境艰苦，但苗族的精神是自由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过，人类在美学上的创造直接或间接源于他们丰富的精神层面，并在潜意识里将最晦暗的思想大胆融入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中（于秀英译，2002）。

苗族诗人王伯理在诗集《我知道的亡者：重生的咒语》中的《屠宰场梦境》一则中，描述了王伯理年幼时随父亲一同去的屠宰牲口的场面。当时的王伯理内心充满了恐惧，他注视着那些被宰的牲口，感觉它们的眼睛犹如珍珠般闪闪发光，它们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双眼默默注视着宰割它们的人，任由那屠刀的光芒闪烁。王伯理和族人们就像那一头头待宰的牲口一般，尝尽了濒死的滋味，战争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挥之不去。王伯理在诗中说道，多年以后，“我”在梦中梦见“我”就是那头即将被宰杀的牛，梦见了链条和皮带，梦见了脚踝被人举起，高高悬挂，像是生锈衣杆上挂着的布匹，有人割开“我”的脖子，有人剥开“我”的骨头，有人拉扯“我”的头颅。“我”却无力反抗，只能任由摆布。

王伯理在诗歌《战猴》中，将苗族比作手无寸铁的猴子，他们是狗的猎物，被士兵随意袭击。苗族人的脸是淤青的，手腕是绑着的，宛如一只即将掉落的芒果，奄奄一息地站在被挖好的洞里，还不得不在洞中完成吃喝拉撒的事情。苗族人对在战争中遭受的一切充满了无助与恐惧，所有的事情都不由他们控制，他们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王伯理亲眼看见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尸横遍野的场面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也对苗族今后的生活造成了无尽的痛苦。这种痛苦让苗族人在隐忍中度过许多年，甚至在余生中都产生了难以抹去的影响。王伯理在诗中写道，“我”有时不得不在凌晨五点醒来，父亲在战争中的经历让“我”痛不欲生，“我”时常在清晨悲叹，“我”还发现父亲变得多愁善感，他会为掉落的鸟巢哭泣，掉落的鸟蛋洒落一地，如同眼泪般支离破碎，小鸟的父母丝毫没有线索。苗族人经历了战争，经历了亲人离去和家人分离，他们的心灵被摧毁，但仍然不得不坚强地活着，勇敢地度过自己的余生。

在苗族作家的散文《献给你们，我的弟弟》中，作者的两名刚成年的弟弟怀揣着英雄主义的情怀奔赴前线，然而血腥的、毫无意义的秘密战争给兄弟二人带来了无尽的伤害，他们长时间生活在恐怖的环境中，目睹士兵对百姓肆意杀戮，战友们在身边惨亡。战争的经历使两个弟弟常常被噩梦惊醒，在写给家人的信件中，他们也无处不透露出内心的痛苦和重负，但又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强地生活。

在苗族作家熊霍的散文《最后一次漫步》中，作者描写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苗族老人，这位老人深陷危机，五十多岁的人却有七十多岁的样貌，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这位老人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他却觉得异乡的生活犹如监狱一般，尤其在他妻子去世后，他就彻底陷入了沉寂和黑暗。语言障碍让他很少开口说话，哪怕面对自己的孩子时也是如此，他以疏离的方式减轻自己曾经受过的煎熬，脑海里充满了对老挝难民营的回忆，他感觉日子漫长而空洞，乏味且寂寞，痛苦而煎熬，生活的经历让这位苗族老人对生活失去信心，对环境失望，他最终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内心的痛苦。

苗族作家马枚能在诗歌中写道，一些苗族人的名字被刻在了墓碑上，他们的勇气得到了认可，他们的牺牲得到了承认。当管理员问到“我”是否认识埋葬在这里的人，“我”却失语了，“我”家里有六个人死在了战场上。他们本应留下来照顾“我”，但却没有。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我”却找不到自己战亡的家人或其他苗族同胞的名字，逝去的灵魂早已消散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苗族诗人马波用诗歌记录了苗族迁徙的悲壮经历。在他创作的诗歌《穿越峡谷》中，马波写道，日光抚慰着他们的头顶，疲惫的脸庞在峡谷中接受着凉风的吹拂，人们走在倒落的树干上，为了不被发现，为了不被峭壁划伤……不经意地往下一瞥，或许就能看到一具尸体，衣服的色彩鲜艳，如同他们的母亲曾有过的传统服饰。

在苗族诗人布莱恩·陶·沃若的作品《最后一首战争诗》中，作者记录了苗族士兵经历的不幸遭遇和不懈斗争。诗中写道，每一位老兵都会告诉你，他们想回到他们的土地、回到他们的生活、回到他们的牲畜那里……丛林中粪水横流，肮脏不堪，血迹斑斑。……苗族的儿子们奔赴战场，兄弟们一个一个死去、叔伯们变成了残疾……他们痛苦地哀嚎。……就让身上的每一个弹眼，都让一首首诗将其缝合。

苗族是一个离散族裔，“离散”（diaspora）常用来形容在人类历史的较大范围的种族迁徙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离散族裔和本土居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等生活中各个方面产生的一系列冲突、矛盾、适应、融合的问题。后来，

一些学者使用“离散”一词泛指离开传统家园而移居到别处生活的人群。苗族文学许多作品都呈现了民族的归属感和融合度方面的亲身感受，也表露了他们在不同意识影响下出现的冲突、碰撞。苗族文学表现了苗族迁徙各个支系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以及苗族移民融入他族文化和他族审美意识时的困惑。尤其在悲壮中体现的归属意识是苗族世世代代亘古不变的话题，归属意识在苗族小说集《母亲》、散文集《界碑》，沈从文小说、石太瑞诗歌集、杨嘉莉的《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马玫宁编著的小说集《橡树林中的翠竹》，还有其他一些苗族作家，如马珀斯、杨安鲁、李雅诗、侯梅德等发表于《丛林》《北美评论》《连接符》《犁铧》等文学期刊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表述。苗族作家往往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回忆和口传等方式记录对苗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描述对回归家园和民族归属的精神向往和追求。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表现了深郁的思乡情怀和民族情节，显示了离散苗族和传统家园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所以，通过对苗族现当代文学作品展开剖析，可以更深入地探究苗族传统文化的形成、继承、传播，进一步通过苗族文学作品深度了解苗族审美意识的表现形式。苗族在迁徙过程中，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居住地文化和审美意识影响，苗族传统文化也被不断注入了新的养分。此外，苗族还是一个世界民族，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尽管不同苗族支系和居住地的融合日益加深，但苗族的民族归属和家园意识一直保留，苗族作家也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了民族在异地生存发展和思念故乡的复杂情怀。

苗族是历经迁徙的民族，不断迁徙的历史使苗族形成了以劳动为美、以悲壮为美的审美意识。通过对苗族现当代文学的解读和分析可以看出，苗族的审美意识植根于苗族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承于苗族迁徙历程，继承和发扬于民族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改变，苗族审美意识的本质没有改变，勤劳朴实的风格没有改变，善良舍己的传统没有改变，苗族将悲壮沉郁的经历始终铭记于心。

第3章　苗族生活环境与审美意识

生活环境既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指社会环境。首先，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类要从自然环境中索取必需的物质资源。自然环境既是帮助人类认识自我的直接参照，也是人类生存的精神对象。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敬和畏惧是原始宗教形成的心理基础，苗族宗教信仰的建立同样基于对自然敬畏的基础。苗族的传统文化里有对蝴蝶图腾、枫树图腾、狗图腾、牛图腾等的崇拜，苗族村寨里还有对神树、神山的崇拜，苗族早期对神的敬仰都以大自然的物化形态作为参照。在中国，苗族的三大方言区，即东部方言、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都将枫树称为妈妈树，枫树是传说中苗族始祖“蝴蝶妈妈”的母体，对苗族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苗族每迁徙到一处，都会种植一棵枫树。假如枫树能成活，苗族人则认为此地适合居住，便会安顿下来；如果枫树不能成活，苗族人就会继续寻找适合居住的地方。苗族人对枫树的崇拜不只如此，他们还用枫木制作祭祖的鼓，或用枫叶盖住用以祭祖杀牛的刀口。苗族的图腾崇拜将苗族个体生命现象和大自然密切相连，苗族常常认为他们和图腾动物有共同的祖先，并通过图腾动物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然界中的日、月、山、水、气候、地形等都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结合整合了社会文化。因此，自然环境是人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条件，苗族不断迁徙的生活现状迫使他们不停变化自然环境，其审美意识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融入新的元素，新的元素促使苗族的审美意识不断发展。

3.1　苗族的自然美意识

在历史上，苗族拥有着受强大外力影响而被迫迁徙的艰辛历程，这段经历决定了苗族复杂的生存环境。苗族的不同支系，在迁徙过程中所居之处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荒山野岭或是崇山峻岭。我国的苗族主要居住在云贵高原，大娄山以南，雪峰山以西，哀牢山以东。在苗族口传中，就有“苗族住山顶”“苗族住山头”“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鸡犬相闻，行走半天”等说法，这些

说法都客观地反映了苗族的居住环境。苗族对居住地的选择并非出于自己的喜好，而是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一方面，苗族在许多居住地都是后来者，平缓的地带已为其他民族所占；另一方面，苗族的迁徙历程也是逃亡的历程，逃亡的经历给苗族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因此苗族向往平和自由的生活，形成了远离是非的心理。

在中国，苗族在迁徙过程中生活的地区，通常海拔较高，气候较为恶劣，年均气温在 16℃左右，年均降雨量在 800 至 1500 毫米之间，年均日照时间为 1400 小时左右，相对湿度为 70%到 80%。春季则水源断流，天旱地裂，不易耕种。夏季炎热多雨，多有山洪暴发，水土流失，灾害频繁。秋季总体气候较好，但季节较短，不易收割。冬季云雾重重，细雨绵绵，阴冷潮湿，日照较短（熊玉有，2003）。苗族不同支系生活地点也有所不同，气候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的来说，苗族居住地气候条件不利于生产劳动，苗族生活条件艰苦。

苗族的不同支系拥有不同的自然环境资源，自然资源是苗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苗族的审美意识形成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自然对苗族审美意识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现象的敬畏和崇拜。苗族对自然的崇拜是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并成了整个民族的记忆。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苗族形成了自身智慧和力量的有限性和自然力量无限性的强烈对比。苗族的主体精神感觉压抑，在和自然相处的无奈和委屈中，苗族人常常把人的力量对象化，试图通过假想的方式用一些具有生命伟力的形象征服自然。苗族对自然伟力的崇拜以及将审美和功利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对幼年苗族的民族审美意识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和具有神秘力量的自然伟力，苗族创造了可以驾驭自然的神。苗族古歌《开天辟地》就有苗族对世界起源的想象，苗族人认为，姜央是人类的祖先，创造了天和地，创造了山，创造了水，创造了坡，创造了井……《开天辟地》写道，“山生野菜，水生浮薄，坡生炸蛾，井生刚研”。姜央还创造了鸡，鸡可以报晓；创造了牛，牛用来拉犁；创造了田，田用来种稻。在苗族史诗《十二个蛋》中，苗族认为蝴蝶蛋孵化了人类的祖先，并将蝴蝶称为蝴蝶妈妈。苗族古歌中还流传着风生了雾，雾生了云，云又生了雨，雨落到地上，地上长起了枫树，枫树长大引来了鸟雀，鸟雀在枝头唱歌，歌声惹怒了女神，女神砍倒了枫树，树心变成了美丽的蝴蝶，蝴蝶生下了十二个蛋，叫作申狃蛋，请来了脊宇鸟帮忙孵化。十二个蛋分别孵化成了姜央、龙王、雷公、象、羊、鸡、牛、蛇、虎、狗、山猫、蜈蚣十二兄弟，也就是苗家的十二古祖神。

苗族现当代文学也沿承着苗族对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敬畏之情。伍略在小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